

20世纪中德贸易交往历程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Sino-German trade histor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wentieth Century

杨捷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Sino-German trade histor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wentieth Century

20世纪中德贸易交往历程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杨捷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德贸易交往历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杨捷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210-08831-8

I. ①2… II. ①杨… III. ①中德关系-双边贸易-
影响因素-研究-20 世纪 IV. ①F752.7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6826 号

20 世纪中德贸易交往历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杨捷 著

责任编辑 蒲 浩

装帧设计 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发行 江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33006)

承 印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6.375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210-08831-8

定 价 36.80 元

赣版权登字—01—201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发 行 部 0791-86898815

编 辑 部 0791-86899010 E-mail taxue888@foxmail.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1
一、选题意义	1
二、学术史回顾	2
三、本书的研究任务	9
第一章 历史溯源:20 世纪之前的中德贸易交往	11
第一节 早期中德关系及贸易交往的开启	11
第二节 鸦片战争影响下的中德贸易交往	18
第三节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的中德贸易交往	27
第二章 从繁荣到重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中德贸易交往	37
第一节 一战前德意志帝国与清政府的贸易交往	37
第二节 一战后的中德贸易关系重构及其动因	59
第三章 蜜月: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中德“易货贸易”	72
第一节 利于中德贸易交往的思想和主张:个案分析	72
第二节 30 年代中德“易货贸易”的形成和运作	82

第三节 中德“易货贸易”兴盛的原因	95
第四章 分道扬镳:纳粹德国远东政策的嬗变与中德贸易衰落	101
第一节 纳粹执政初期的远东政策及其对中德贸易的影响	102
第二节 纳粹“亲日弃华”的开启与中国政府的反应	106
第三节 纳粹“亲日弃华”的深化与中德贸易的终结	111
第五章 在冷战阴霾下:二战后的中德贸易交往及其影响因素	118
第一节 冷战时期中国与联邦德国的贸易交往	118
第二节 冷战时期中国与民主德国的贸易交往	139
第三节 冷战因素对中国与德意志国家贸易关系的影响	145
第六章 迈向新纪元:两德统一前后的中德贸易交往	150
第一节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与西德、东德的贸易交往	150
第二节 两德统一后的 90 年代中德贸易交往	160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168
参考文献	178
附录一	187
附录二	194
后 记	198

前 言

一、选题意义

在以“20 世纪中外关系”为对象的学术研究中,中国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中成果颇丰。相比之下,中国与另一个大国——德国关系的研究却显得较为薄弱。尽管,近年来也有不少相关著作和论文问世,但由于受到从事研究的人员少、缺乏丰富的历史资料、语言运用等因素的制约,我国中德关系史的研究成果与上述几个领域相比,不论在质量还是在数量上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这样的现实,对当下的研究者来说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机遇,更为笔者的选题提供了较大的写作空间。此外,当今的中国和德国同为国际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大国,其双边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彼此而言,发展与对方的合作关系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由于地缘因素,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德两国在政治与安全领域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这也为两国发展友好关系提供了有利的基础和条件。在中国与德意志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交往中,经济关系是主轴与核心,加强对中德经济关系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全面、

客观地审视两国间的双边关系。对于中德两个在地理上相隔万里的国家而言,要建立和发展经济联系,贸易是先导和基础。在整个 20 世纪,德意志国家的历届政府都曾有过与中国的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互惠贸易的历史,并以此为契机建立了较为友好的双边关系。在今天,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的德国和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自建交以来以贸易为中心的双边经济关系不断密切。对中国来说,德国已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同样在德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样的形势也带动了两国的相关政治、文化等关系的长足发展。所以,有关中德贸易问题的研究,不但应该成为认识两国经济关系的重要课题,而且对于推动我们从新的角度对中德关系作整体分析大有裨益。

二、学术史回顾

(一)对早期(19 世纪中期之前)中德关系的研究

19 世纪中叶之前,中德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以文化及科技交流为主,在这一过程中,来华传教士、德国籍学者及文学家起到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杨武能所著《歌德与中国》(三联书店 1991 年)、张国刚所著《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 1994 年),均属于探讨中德文化交流史的优秀论著。前者一方面考察了 17 世纪和 18 世纪德国及欧洲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对歌德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论述了近 100 多年来中国对歌德的接受;后者则系统地论述了汤若望来华以来的 300 多年间德国汉学研究的历程。

对典型性历史人物的研究,是探讨这一时段中德关系的重要方式。中德关系史上最早的重要历史人物首推汤若望(1592—1666),他于 1619 年到达中国,曾在明清两朝任职,官至钦天监监正,为中德

早期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有关研究汤若望的学术成果有：董伯先的论文《中德文化交流的先驱者——汤若望》（《德国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2期）、林铁钧的论文《汤若望与顺治帝》（《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1期）、李兰琴的论文《汤若望简论》（《世界历史》1989年第1期），以及陆敬严的论文《中德科技交流的先驱——汤若望》（《中国科技史料》1993年第2期）、康志杰的论文《西学东渐的先行者汤若望》（《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3期）等。

另一位在中德文化交流史具有独特地位的重要人物是莱布尼茨。研究他的成果有：焦树安的论文《谈莱布尼茨论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和《二进制数学创始者辨正》（《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秦家懿的论文《莱布尼茨和中国理学思想》（《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李春仁、赵俭的论文《中西比较哲学的先驱之一——莱布尼茨》（《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孙小礼的论文《莱布尼茨与中西文化交流》（《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年第12期）和《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两大发现》（《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

中文写作体系中系统研究早期中德经济和贸易关系的论著，当属台湾学者余文堂所著《中德早期贸易关系》（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最为出名。该书在丰富的史料、文献的基础上，客观和全面地分析了早期中德贸易的发展及其动因，是后人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此外，还有一些专门论述早期中德经贸关系史的论文。例如董伯先的《早期中德贸易关系》（《德国史研究通讯》第2期），周显理的《早期中德贸易关系初探》（《中德关系史文丛》第2辑），陈月清的《德国对近代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李厚基、周荃的《试论德国占领青岛后山东对外贸易重心的转移》（均收入《中德关系史文丛》第1辑），以及

陈纪遥的《十九世纪中德贸易往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等。

(二)对 19 世纪中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德关系的研究

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德意志国家开始走上统一的道路并逐步加入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行列。1861 年,清政府被迫与德国在天津签订了《通商条约》,该条约标志着中国与德意志国家(当时以普鲁士为代表)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871 年普法战争后德意志帝国实现统一,继而大大加快了发展在华势力的步伐,甚而不惜采用“炮舰外交”。1895 年,清政府被迫与德意志帝国签订汉口、天津两处租界的协议;两年后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湾,并于次年强行“租借”该地;1900 年德国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德籍元帅瓦德西出任八国联军统帅。德意志帝国的势力,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逐步从中国退出。上述历史阶段中德关系的主要特点是,德国同其他西方列强一道处于对华侵略的地位。出于民族觉醒和求强、勿忘国耻等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中国学者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德关系史也进行了大量的、多方面的研究。

有关考察德国势力侵入山东并强占胶州湾的论著有:胡汶本的《试论德国帝国主义在山东势力的形成(1897—1914)》(《文史哲》1982 年第 2 期)、王守中的《巨野教案与德占胶澳》(《文史哲》1983 年第 5 期)、李学通的《醇亲王载沣使德史实考》(《历史档案》1990 年第 2 期)、丁名楠的《德国与义和团运动》(《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6 期)、苏晨的《张荫桓与戊戌英德借款和胶州湾、旅大租借》(《学术研究》1994 年第 6 期)等。甲午战争后的中日《马关条约》,曾把辽东半岛割给日本,俄、法、德三国出于各自的利益强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史称“三国干涉还辽”。与此有关的论文有:周荃、李厚基的《谈 1914

年日德青岛之战》(《齐鲁学刊》1987年第4期)、戚其章的《中日〈辽南条约〉与俄德法三国同盟》(《东岳论丛》1988年第5期)、李厚基的《论日德冲突的由来及对远东国际关系的影响——1914年日德青岛之战的历史背景》(收于《中德关系史文丛》第2辑)等。此外,在晚清洋务运动中,德意志的军队体制和军事技术成为清廷洋务派仿效的对象,并派遣官员赴德受训及聘用德国军官来华。与此有关的论文有:王建华的《晚清军事改革与日、德、俄三国的控制》(《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郑宗有和易文君的《论洋务运动与德国》(《史林》1994年第2期)等。

(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的中德关系的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进入魏玛共和国时期,直至1933年希特勒上台。在中国方面,1927年以前为北洋军阀政府与广东革命政府对峙及北伐战争时期,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因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日战争因素,德国出于拉拢日本充当实现自身对外扩张战略的“远东盟友”的需要,不断在对外外交上做出有损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情,导致中德关系不断恶化,1941年因希特勒承认汪精卫伪政权,重庆国民政府与纳粹德国政府正式断交。

这一阶段的中德关系呈现出十分复杂而独特的情形,引起中国学者极大兴趣,出现了众多的著作。当然还有不少论著是以该阶段为重心,进而全面论述中德关系的专著,其中以吴景平所著《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最具代表性。该书的时间跨度大,包括的范围较广,尤其是利用了两部《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1—1919)、(1919—193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985)以及伦敦英国政府文书局1959—1983年发表的《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C辑和D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

值。其他的著作则多为断代性和展望性的论著,例如马振犊、戚如高所著《友呼?敌呼?——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在1998年以《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为书名,出版了马振犊、戚如高的这本著作);陈仁霞所著《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三联书店2003年)。

在海外对近代以来中德关系研究的著作中,以美国著名汉学家柯伟林所著的《德国与中华民国》(1984年,后中译本更名为《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为佳。该书主要研究1928—1938年的中德关系史,引用了大量中文尤其是外文档案资料,是断代中德政治关系史的力作。不过,由于此书英文版原著出版于1984年,对此后我国发表的有关论文和史料未能加以利用。此外,德国学者施丢克尔的《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较为全面客观地展现了19世纪中德贸易的全貌,对两国海军装备的往来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此书把中德军火贸易归属于所谓一般性“生意”范畴。

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德关系的论文主要有:王健、陈先春的《试析一战时期中德关系的演变》(《史林》1993年第1期),石源华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京政府的对德宣战》(《军事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李乐曾的《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与德国》(《上海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对华政策》(《德国研究》1994年第1期)、《关于赛克特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和《赛克特在华活动述评》(《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张北根的《1927至1933年的中德关系》(《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4期)和《1933—1941年的中德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张宪文的《30年代中德关系初探》(《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胡献的《华北事变到淞沪会战间的中德关系》(《档案史料与研究》

1993年第4期),李兰琴的《德国来华军事顾问团活动初探》(《晋阳学刊》1989年第4期)、《试论20世纪30年代德国对华政策》(《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苏瑞林的《两次大战期间德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中德关系史文丛》第2辑),马骏的《二三十年代中德军事合作始末概论》(《中德关系史文丛》第2辑)和《日本侵华后的中德关系及其变化》(《世界历史》1989年第3期),吴首天的《德国军事顾问与蒋介石政权》(《民国档案》1988年第1期),孙果达的《国民党政府中的德国军事顾问述论》(《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吴景平的《汉斯·克兰与抗战前的中德关系》(《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和《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的中国之行述评》(《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杨玉生的《论纳粹德国远东政策的演变》(《史学集刊》1989年第4期),梁星亮的《简论全面抗战爆发后德国的对华政策》(《西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曾巍的《国民政府与德国断交原因浅析》(《复旦学报》1994年第4期)等。

相比之下,我国学者对二战后的联邦德国与中国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有:李乐曾的《德国对华政策透视》(《德国研究》1997年第4期),张晴的《德国对华政策的经济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9期),宋坚的《中德经贸关系的动向及对策》(《德国研究》1998年第1期),陈亚温的《中德经贸关系的回首与展望》(《中国经济问题》2000年第3期),连如玉的《浅谈21世纪中德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2期),陈锋的《中德关系30年》(《德国研究》2002年第3期),潘琪昌的《伯尔尼会谈——中德关系史上的一段秘史》(《德国研究》2002年第3期),栾文莲的《中国与德国的贸易关系》(《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38期),李树源、智佳佳的《中德经贸关系的特点及展望》(《黑龙江对外经贸》2004年第3期)。此外,顾俊礼、

刘立群所著《迈入 21 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刘立群所著《新世纪的德国与中国:记录中德建交三十周年》(2003 年)等文集也极具学术价值。

与此同时,我国唯一专门从事德国史研究的全国性学术机构——中国德国史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召开了四次大型学术会议,均将“中德关系”列为主要议题,并把学者们提交的相关文章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辑出版。主要有:赵振玖主编的《中德关系史文丛》第 1 辑(中国建设出版社 1987 年);刘善章、周荃主编的《中德关系史文丛》第 2 辑(青岛出版社 1991 年);刘善章、周荃主编的《中德关系史译文集》(青岛出版社 1992 年);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等编的《德国史论文集》(青岛出版社 1992 年)中收入中国学者关于中德关系史的论文 6 篇。此外,该会所编的《德国史研究通讯》(1982、1983、1992)中共有中德关系史的论文 9 篇。以上各书中合计中国学者关于中德关系史的论文共有 47 篇。

在我国有关 20 世纪中德关系的文献档案的编辑中,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 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最具影响。该书共计 45 万字,全部资料均系首次刊布,其中精选了第二历史档案馆有关国民政府与德国外交关系的藏档,包括蒋介石与希特勒间密电密函及中德易货贸易、德国顾问团在华活动、德国与汪伪政权关系等档案。^①

这些学术成果大致呈现以下特点:

(1)在研究的时段方面。前人的著作和论文多集中于对 20 世纪

^① 以上部分参考刘立群:《中德关系史研究在中国》,载《德国研究》,1996 年第 1 期。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末中德关系的论述,而对二战之后的中德关系的论著相对较少,即便是在这些有限的成果中,学者们探研的重点也集中于 90 年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 20 世纪中德关系及相关问题的论述,不但在时段上有缺失,而且缺乏对这类问题全面的、全景式的、连贯性的分析和认识。

(2)在研究的专题方面。对 20 世纪上半叶中德关系的论述,多是对两国政治关系、军事关系和综合性外交关系的分析。在探究双边经济与贸易的问题上,虽然有一些学者作过一些开拓性的工作,但并不全面,单独论述该问题的论著很少,且多是从中国的角度、以中国为重心来加以分析。对二战后的中德关系的论述,有关经济和贸易的文章在数量上占有一定的比例。但由于资料有限,而且不少作者是专业从事经济和贸易研究的人员,所以在写作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结合两国关系的其他方面尤其是政治因素和历史因素加以论述上作得不是很深刻,需要进一步提高和深化。

(3)在研究所使用的文献和资料方面。学者们在大量参考中方文献、档案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加强了对外文资料的运用,但在两者的结合使用和相互佐证上还有文章可作。

三、本书的研究任务

鉴于上述特点,本书拟在以下几个方面作新的研究和尝试:

首先,在现代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国家间贸易已经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活动了。它渗透了政治的影响,与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对外战略紧密相连。贸易既是国家合作的渠道,它使不同的国家互通有无,协调发展;也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影响、牵制与施压的手段。两国关系发展良好,两国的贸易便呈现出繁荣与合作发

展的势头,此时贸易便是加强两国合作与友好的手段。两国之间倘若出现了分歧与摩擦,国家之间关系恶化,它们之间的贸易便随之减少甚至中止。贸易作为两国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显地反映出交往国家之间的政治冷暖变化。选择“中德贸易”为研究方向和专题,紧扣双边关系中的“贸易”问题,并以此为中心辐射中德关系的全局。笔者将“贸易”作为写作的重心,但不单纯为“贸易”而“写贸易”。文章既注重分析贸易的“经济性”,也兼顾认识贸易的“政治性”;既论述贸易与其他经济活动的互动,又论述贸易与全面双边关系的互动。同时,以 20 世纪中德贸易交往为基本面,揭示出自近代以来中国与德意志国家之间从“不平等”贸易到“互惠”贸易的历史变迁。

其次,在研究重心的选择上,力求突破以往在论述中德关系和德国对华关系时,偏重于某些特定历史阶段的现象。笔者试图将整个 20 世纪的德国对华关系作为一个统一的、连贯的时间段作整体性的分析,以更加宏观的视角为平台,来分析 20 世纪不同历史时期的微观化的双边关系。

再者,对于具体起止时间的划定,笔者结合中德贸易和双方整体外交的特点,突出贸易的互惠性和政治的平等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回顾 20 世纪之前清政府与德意志国家贸易关系的基础上,重点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20 世纪 30 年代、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等若干时段,论述这些时段中德两国贸易交往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关键政策及其转折点、外在制约性因素等内容,分析力求做到详略得当、突出重点。

最后,在参考资料的使用上,力争做到中文与外文文献、史料结合,档案文献与著作论文并用,使本书的论述较之以往的一些文章更为有力。

第一章

历史溯源:20 世纪之前的中德贸易交往

第一节 早期中德关系及贸易交往的开启

专注于早期中德关系研究的台湾学者余文堂认为,中国与德意志民族国家交往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 13 世纪中叶。1241 年春天,蒙古帝国军事家、成吉思汗之孙孛儿只斤·拔都的西征,引发了历史上中(蒙古)、德双方在今天波兰西南部西里西亚地区的里格尼茨附近大平原上的首次军事冲突。在成功侵袭奥地利和匈牙利之后,蒙古铁骑还继续在巴尔干半岛北方攻击日耳曼人的聚居群落。^①

不久之后的 13 世纪中后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历中国后出版的那部轰动欧洲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首次向欧洲人展示了东方古国——中国的富裕和高度文明,从而引起了整个欧洲对中国的羡慕和向往。从 16 世纪起,大批欧洲人到中国来“淘金”,

^① 详见余文堂:《拔都西征开启中德早期关系》,载台湾《中兴大学历史学报》,2000 年第 11 期。

一个名叫福格的德意志人开设的一家商行也在其中。以此为起点,越来越多的德意志商人来华从事贸易活动,双方的民间经济往来趋于频繁;同时,一些德意志传教士为了向东方传播所谓的“上帝福音”,也陆续来到中国,远隔万里之遥的中德两国之间的交往由此完全开启。

17 世纪中叶的德国人汤若望,是欧洲来华耶稣教会中最负盛名的传教士,他于 1622 年和法国传教士金民阁一同来到中国,他先后服务于明清两朝政府,主要负责编修历法且颇受当时统治者的青睐。汤若望在清顺治时期的工作尤其出色,因此倍受朝廷重用,以至于不断加官晋爵、位列公卿,顺治皇帝甚至尊称其为“可敬之父”。^①

从中西交流的历史贡献上看,汤若望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引入中国人的视野,并把带有浓厚德意志色彩的文化事物介绍到中国,拓展了中德之间思想文化交流的路径。同时,汤若望等德籍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也使德意志民族受益匪浅。他们通过翻译中国的经典文集和出版介绍、研究中国的各类著作,向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和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的真实信息。其中,中国的绘画和园林艺术对欧洲和德国艺术的影响尤深。德国的卡赛尔伯爵甚至按图索骥,建立一座名为“木兰”的中式村庄,村旁小溪则被冠以“吴江”的称谓。从更广阔的艺术层面上讲,新奇、精致、纤巧和幽雅的中国艺术品,成为西方风行一时的追求秀丽多姿、崇尚新奇的洛可可艺术的源泉。^②中国与德意志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为双方经济贸易关系的起步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双边贸易的开展也是支撑彼此文化交往不断深入的重要平台。

① 黄永祥、代天宇:《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7 年,第 412 页。

② 黄永祥、代天宇:《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7 年,第 414 页。